

我所体验的社会主义



现代外国政治
学术著作选译

〔日〕 菊地昌典 著

谭 美 华 译

吉林人民出版社

我所体验的社会主义

〔日〕菊地昌典 著
谭 美 华 译

吉林人民出版社

我所体验的社会主义

[日] 菊地昌典 著

谭 美 华 译

*

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长春新华印刷厂印刷

*

850×1168毫米32开本 5印张 110,000字

1983年3月第1版 1983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2,510册

统一书号：3091·472 定价：0.52元

为了研究和探讨现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各种社会主义模式的理论和实践、各种共产主义流派学说以及其他政治学说，了解外国政治、社会和学术情况，我国部分出版社分别组织翻译一批有代表性的现代外国政治学术著作，供有关方面研究参考，本书是其中一种。

60.1.28

15

前 言

《我所体验的社会主义》于一九七六年由日本每日新闻社出版发行。

作者 菊地 昌典，一九三〇年生于日本东京都，现为东京大学教授，曾在苏联留学，访问过中、南、朝、捷、越等国，从六十年代起专门从事苏联历史和社会主义理论的研究，写过许多论述苏联政治和社会主义理论的书籍和文章，主要著作有《作为一个历史时期的斯大林时代》、《论现代苏联》、《社会主义与人》、《人类变革的理论与尝试》等。

作者在本书中回忆他面临日本战败这个历史事实时的思想情况时说，我觉得“当时所有的价值观都遭到彻底粉碎”，这是因为“我直接接受了彻底的日本军国主义教育，这种教育已从皮肤渗透到骨髓”，加之战时又看不到有关社会主义的书籍，因此不可能从理论上理解社会主义。但在战后混乱中，出现了社会主义这个词，以及后来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出现的种种情况，“使我强烈地关心起社会主义来”。这就是作者研究苏联历史和社会主义理论的思想基础。

作者在本书中，围绕社会主义模式这个主题，以苏联、南斯拉夫等国的现实为依据，剖析了苏联的社会制度和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体制的种种弊端及其矛盾，并提出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建立真正社会主义社会的设想。作者的有些分析和观点，可供我们研究和探索社会主义模式时参考，但有的观点是片面的，乃至错误的。

作者在谈到什么是真正社会主义时说，“不应当把计划经济和实现生产资料国有化和集体化的程度作为衡量社会主义的标志”，生产资料国有化并不等于社会主义，也不反映劳动人民的直接利益，因为直接掌握生产资料的人是由国家任命的“行政官僚”和“技术官僚”，所以说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还是停留在政治革命阶段，如果不继而进行经济和文化革命，不从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领域消除产生这种私有制的残余，就会不断产生追求私有制的思想。真正的社会主义应该没有剥削、没有压迫，即“彻底消灭了资本主义异化”的、劳动人民真正当家作主的社会。苏联和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劳动人民并没有真正成为生产资料的主人，他们没有直接参与企业管理和分配劳动成果的决定权，没有摆脱“仅仅作劳动力”而存在的状况，因此劳动人民没有得到“彻底解放”，重要的精神生活被“束缚”了。

作者还提出了“国权社会主义”和“民权社会主义”的理论观点。他认为，共产党在夺取政权后，实行共产党“一党专政”，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权出现了异化：人民群众被排除在一切经济、社会和政治领域之外，没有成为生产资料的主人，更没享有直接参与企业管理和分配劳动成果的决定权。在这种情况下，劳动人民丧失了主人翁感，只把劳动当作谋生手段，对工资感兴趣，逃避政治；而另一方面，野心家乘机钻进共产党内，结成党官僚的帮派体系，国家权力为极少数“行政官僚”和“技术官僚”所掌握，实行“国权社会主义”。为了避免政权的这种异化，必须把共产党置于人民的监督之下，因为人民群众是“真正主权在民的体现者”，是“揭露社会主义政权的腐败和迫使权力更新的社会力量”。作者赞赏南斯拉夫的现行制度。他认为南斯拉夫不论在工业方面，还是在农业方面，都创造了它“唯一

独特的社会主义形式”。南斯拉夫在所有社会所有制企业里实行工人自治，赋予最基层的工人组织以实权，可以防止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复辟，产生新的剥削，可以防止生产资料被部分官僚掌握，使工人真正成为企业经营管理的主人。南斯拉夫的这种工人自治制是与“国权社会主义”完全对立的“民权社会主义”，它“向国家消亡的方向迈出了大胆的一步”，因而是搞“国权社会主义，还是搞民权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生死攸关的问题”。作者也认为工人自治制度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在给予工人自治权力的同时，“无政府主义”和“自由主义”也可能抬头，因此需要工人的觉悟不断提高才能彻底地实行。

关于社会主义农业集体化问题，作者认为，集体化虽然是实现社会主义的条件之一，但不是“绝对的条件”。农业集体化只有在农民自愿和可以实行机械化的前提下才能进行，强行集体化有“百害而无一利”。南斯拉夫坚决实行以个体所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农业化，即以实现农业产品的流通部门的社会化为首要目的。个体所有制不同于剥削他人劳动的私有制，它始终依靠自己的劳动和生产资料进行生产活动。南斯拉夫的经验表明，实现农业社会主义集体化有两条道路：一是农业集体化，如苏联式的农业集体化道路，二是通过巨大的社会化了了的农业部门，如大型农场与小农之间的合作关系的社会主义化。这正是南斯拉夫开创的农业社会主义集体化的道路。

作者提到建立理想的社会主义社会时说，只有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现有的极为丰富的物质和人民业已争取到的种种权利的基础上，吸取现有社会主义国家的长处，弃其弊端，即把“社会主义的平等嫁接到资本主义的高生产力水平上”，在这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才是理想的社会主义。他认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向社会主义社会变革时，“革命主力已不再仅仅是工人”，而

是包括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在内的“市民”，因为他们扎根于日常生活之中，斗争反而会体现出“更直截地、更激烈地”追求新的社会体制的特点，所以“市民”是“最富有战斗性的力量”。

作者提出的“绝对的政权绝对腐败”，“任何革命政党都不能置身于这一真理之外”的观点，以及其他一些理论观点是不正确的，请读者加以分析、辨别。

本书在翻译出版时，作了一些删节。

目 录

一、寻求社会主义的实体	(1)
内含的矛盾	(1)
如何确立主体性	(8)
矛盾爆发	(16)
对批判斯大林所持的态度	(22)
国家政权腐败	(29)
劳动人民解放的程度	(35)
二、《社会主义与人》的笔记	(43)
资本主义的破绽	(43)
“革命”与“改良”的争论收效无几	(48)
从不同角度展望社会主义	(54)
人类解放对工人来说意味着什么	(59)
工人自治的理想	(68)
私人所有制和个体所有制	(76)
南斯拉夫的农业社会主义化	(82)
南斯拉夫社会主义的探索	(88)
萨哈罗夫的绝望	(97)
日本式国家实现社会主义的条件	(104)
三、“自力更生”的理论	(111)
大庆油田的思想基础	(111)
要求具有阶级觉悟	(117)
中国的朝鲜族	(122)
1. 民族平等	(122)

2. 下放和自留地	(130)
四、社会主义和市民	(136)
形象破灭	(136)
尊重市民的权利	(141)
后 记	(148)

一、寻求社会主义的实体

内含的矛盾

“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徘徊。旧欧洲的一切势力，教皇和沙皇、梅特涅和基佐、法国的激进党人和德国的警察，都为驱除这个幽灵而结成了神圣同盟。”这是在一百二十年前发表的《共产党宣言》开头的一句名言。马克思和恩格斯非常激昂和充满信心地向全欧洲敲响了共产主义即将出现的“警钟”，并嘲笑了被这个“幽灵”吓得胆战心惊，继而千方百计地为驱除这个幽灵而绞尽脑汁的欧洲统治阶级。在1848年当时，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始祖是那样充满信心和从容不迫。“全世界无产者团结起来”，“至今的所有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等众所周知的言论，简直成了共产主义幽灵的出现以及把它引向必然王国的强有力的理论。

现在，威胁世界统治阶级的幽灵究竟是什么呢？或者说应该是什么呢？在《共产党宣言》发表后只经过了六十五年的时间，就在欧洲的一角诞生了以共产主义为目标的新国家。这个国家的名字叫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然而，现在，对这个所谓正在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国家，仍然抱有《共产党宣言》中所大声宣称的那种恐惧心理的人并不多。与此相反，更多的人却对实际上拥有强大军事力量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状况感到疑惑和持否定态度。仅仅经过了一个世纪多一点的时间，曾经徘徊于欧洲，甚至徘徊于世界的这个可怕的幽灵似乎已经消失。现在人们把美苏并立起来作为一个焦点在公开地议

论着，社会主义正在被当作从发展中国家走向先进国家的一种形式。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又重新提出来了；社会主义国家不可避免的弊病，也正在暴露出来。

共产主义这个幽灵把十九世纪中叶的欧洲统治阶级推向了恐怖的深渊。这是因为他们充分认识到这个幽灵必然会超越国家的界限，把工人团结起来，并且意识到隐藏在工人心灵深处的巨大爆炸力。因此，共产主义曾经使统治阶级感到可怕，被压迫阶级曾把它当作希望之星。现在的情况怎样呢？幽灵消失了。徘徊的不是幽灵，而是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对共产主义精神感到惶恐不安的人为数不多，而且都是一般的市民，他们所恐怖的却是现有社会主义国家所存在的集中营、压制民主、官僚制度的统治和丧失自由的忧虑。

一个多世纪之后出现了这种倒退现象，致使美国的一位左翼学者说“欧洲出现了幽灵，是社会民主主义这个幽灵”。自然，发表这种言论的直接原因是捷克事件，但历史是具体的，社会主义的历史也不例外。既然幻想是开放在对社会主义抽象理解的基础上的无果之花，那么这个幻想终究是要破灭的。现在不是要我们去论述社会主义的抽象的概念，而是要根据现实的社会主义提出自己的论点。如果不用具体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种种现实去填补批判斯大林以来二十年的空白，我们头脑中的社会主义形象就将再次遭到毁灭。只要仔细看一看看我国的社会主义形象的历史，就会意识到这种看法是无法否定的。

回忆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当我面临战败这个历史事实时，当时的所有价值观念都被彻底粉碎，而在精神上却过于幼稚。这不是说当时我只有十五岁，而是因为一直接受了彻底的神国日本的军国主义教育，这种教育已从皮肤渗透到骨髓。所谓日本人是最优秀的民族，在大日本帝国不存在劳资对立，大海

彼岸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是赤色帝国主义，这些宣传无时不在耳边回响。满洲事变以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对我这样一个军国主义少年来说，只能从少年杂志附录中关于各国最新武器图解中有所了解。因为从俄国革命到昭和年代初期，在日本一直可以看到的反映工农俄罗斯实际情况的书籍从书店里消失了，所以当时彩色的大开武器图解表就成了我最喜欢的礼物。印象最深的是苏联巨大的坦克群图。

我模模糊糊地知道日本在诺蒙坎事件中遭到了惨败。我似乎从粗糙的图表中看到日本惨败的原因在于苏联拥有占绝对优势的坦克群。我通过那些奇形怪状的、威严而巨大的苏联履带坦克的图片，在我脑海里形成了一种奇妙的国家、捉摸不透的国家和超级军事国家的概念。至于苏联为什么是一个社会主义的、与日本完全不同的异端国家，这个国家究竟怎样？我简直无法想象。在当时，我所勾画出来的苏联形象大概跟我当时想象中的美国形象相差无几，在我脑子里并没有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别。对我来说，苏联和美国都是白人国家，这才是问题所在。在我周围没有见过白人，外国电影也只看过描写柏林奥林匹克的《民族节日》之类的片子，所以除了亚洲的跟自己一样的黄色人种以外，其他国家都是一个谜。使我朦胧地把苏联和社会主义联系在一起的是一九四一年十月发生的左尔格事件。当然象我这样居住在东京小市民区的老百姓家庭来说，“以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德籍机要人员理夏德·左尔格为首的国际谍报团”事件的概要也是不可能知道的。

左尔格事件是在第二年一九四二年五月十七日公开报道的。报纸以醒目的大标题写着：“破获国际谍报团，国内外主犯共五人”。看到这些消息之后，我觉得所谓间谍已钻进政治的中枢部分，因而全身感到不寒而栗，使我对正在胜利发展的战局

也深感不安。我记得，当时“国际谍报团”、“共产国际总部”、“红色谍报组织”、“由日本和外国的共产党员与共产主义者组成”等字句跃入我这个军国主义少年的眼帘，但我很难勾画出日本人和外国人相勾结的情景。特别是关于左尔格，战后当我有机会看到有关他的审讯记录时，再一次受到了一九四二年公开发表这个案件时受到的同样的冲击。他的经历本身就浸透了战争的悲惨。俄国革命爆发时，左尔格在战场上第二次负伤，住进了柏林市内的野战医院，在那里受到马列主义的洗礼，他把苏联当作自己的祖国。他的一生是悲剧性的。所谓悲剧，是说他在苏联的朋友和知己，差不多一个一个地被斯大林清洗了，而他恰恰是在这种情况下，远离自己的祖国，在日本从事间谍活动。我对这样一个结束了悲剧性的生涯的布尔什维克表示了哀悼。

我第一次知道左尔格事件时，全身感到战栗，同时觉得奇怪的是：为什么竟然会有日本人同外国人共同组成的超越国家界限的组织呢？面对这种难以想象的事实，我不能不感到混乱。好象靠静止的思维，僵化的狂热信仰维持平静的水面，突然投入了一块小石头似的。对于我这样一个没有见过白种人的人来说，一切都是我想象之外的事情，我感到，不管是非曲直如何，在这个世界上不仅存在着自己，或者说包括自己在内的日本，确实还有另外一种世界。记得是在战后第二年，我真有了这种认识，并开始对那个世界产生了共鸣。这一年，左尔格事件的牺牲者尾崎秀实写的《爱情犹如降临的星星》一书成了畅销书。我意识到，当初该案件公诸于世的时候，我曾厌恶的“不法分子”是多么富有人情味。因此，八月十五日不仅是我的价值观念转变的日子，而且是我开始形成新的价值观念的日子。

战败后的混乱，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当时的日本是一个没有秩序的完全自由的世界，丝毫没有革命临近之感。民众被抛弃在街头，当然我也包括在内，都为饥饿和寒冷的逼近而焦急，但由于搬掉了天皇制这块莫名其妙的大石头，确实有一种得到解放的充实感觉，虽然夹杂着某些迷惑不解的心情。用再生纸印刷的关于社会主义的小册子同黄色古怪的杂志一起充斥于书店。不仅有马克思、列宁的著作，还有克鲁泡特金、考茨基的著作，这些都并排在书摊上出售。普列汉诺夫的著作也是一样。象我这样一个曾经是井上日召之类的少年，曾主张一命换一命，梦想在日本本土进行决战，为什么会如饥似渴地阅读社会主义的文献？要说明这样一个问题，似乎很简单，但又不是那么容易。一个在混乱时期渡过了敏感的少年时代的人，他的思想结构必然是缺乏逻辑的。在他曲折的经历中，包含着无法捉摸的虚构和非逻辑的东西。

在那薄如绢纱的再生纸上，深深地印上了“阶级斗争”的字眼。“要把社会看作是阶级社会”这类话，对我这样一个一直为生活在以天皇为父的日本共同体中而感到心情激动的人来说，实在是太新鲜了。社会的存在决定人的意识这样的教义，对于我这样一个在战争中房屋被烧毁，在战后通货膨胀的情况下被迫担负起抚养失业家庭的重任，自己又濒于营养失调的少年来说，简直把它看成是神的启示。按照这种教义，我无疑要成为一个具有最强烈阶级意识的人了。虽然还是学生，实际上却要养活家属，或给家里寄钱，这样的穷学生占压倒多数。日本中产阶级的急剧崩溃大概成了战败后一个时期的开端。学生运动本身成为社会运动先驱的客观条件已充分具备。河上肇的《贫困的故事》和《资本论解说》等是独自研究社会主义的最好的入门书，但是，与其采取这种迂回的方法，不如加入日本共产党直

接同列宁、斯大林的名字联系在一起，恐怕这是一条捷径。斯大林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也是用再生纸印刷的，是一本厚厚的书籍，它成了必读文献。

日本人同社会主义的关系，可以说以战败为界限，进入了一个与战前截然不同的阶段。换句话说，也许可以说已从过去抽象的社会主义过渡到具体的社会主义了。因为在社会主义苏联有过生活体验的人一下子回到了日本，虽然他们是以被拘留者的特殊身分生活在苏联。我认为可以把这些归国者的体验看成是有史以来的群众性的大规模的留学体验。这不是少数优秀知识分子的留学，而是人数达六十万的日本平民“留学”苏联，这一事实可以说是一种值得瞩目的史无前例的民族体验，他们不仅被分散到西伯利亚、蒙古，而且辗转整个苏联，被关在各地的集中营里。这六十万日本人受到定额制的奴役。象渣滓似地沉淀在他们心灵深处的社会主义，才是日本人的社会主义的起点，或者说这成了日本人的社会主义的核心。

被称为工人国家的苏联，在穿上士兵服的日本工人、农民的眼里是怎样反映的呢？这件事在考虑社会主义的时候是不能忽视的。即使隔着集中营的带刺的铁丝网，他们的视线也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观察到苏联人民过着怎样的生活。在战后日本社会的动荡不安中，朦胧地浮现在脑子里的社会主义形象同“留学”苏联的人们实际体验到的社会主义形象两者之间既有一致点，又存在差异，应该怎样看待这个问题呢？我就是从这里开始认识社会主义的。当然，对日本共产党以及许多社会主义者来说，这两个形象应该是完全一致的。想象和实际应该浑然一体，理想应该是走向现实过程的先导，两者之间不可能有矛盾。如果认为两者之间有矛盾，或有差异，通常都是很勉强地把现实纳入理想的范畴来理解，来领会，不可能一方面把社会

主义的理想看成是美好的，同时又对社会主义的现实采取否定的态度。因为这样必然会导致理想本身的破灭。理想和现实是一种不即不离的关系，它们是在同一条单轨上存在和移动的，如果失去了这个前提，马克思主义存在的基础就将动摇。我认为，不能否认冷战体制起到了从外部大力加强这种想法的作用，而且一九四九年新中国的成立和中苏蜜月时代的出现又成了稳定这种想法的重要基础。

斯大林的名字对日本人，尤其是对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来说，简直成了使人们重新认识打倒了德国法西斯和日本天皇制法西斯的苏联社会主义潜力的象征。战前，布哈林的著作，还有更多的斯大林的著作同列宁的著作一起曾被广泛地阅读。但在苏联大肆清洗的时期，我国一直采取了闭关自守的政策，战败后斯大林元帅的名字象洪水一样涌到日本，加上在他晚年苏联出现了个人崇拜，可是斯大林的名字就更加席卷了日本进步的舆论界。特别是《党史》、编纂在《党史》中的他的哲学著作《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和斯大林的论文集《列宁主义问题》等书籍为许多人爱不释手。在日文版《列宁主义问题》的扉页上印有斯大林一九五一年除夕给日本人民的新年贺词，贺词说，“苏联人民对于因被外国占领而遭到不幸的日本人民寄予深切的同情”。

现在放在我桌上的日文版《列宁主义问题》，也有日本某编者的这样一段话：“最后，我们怀着诚挚的心情将本书献给神采奕奕的、即将迎接七十一诞辰（十二月二十一日）的斯大林同志，‘献给在斗争中即将迎来靖和的日本和日本人民’的带路人日本共产党及其领导人和全体党员以及全体劳动人民！”这就使我懂得，既然是这样一种头脑，就根本不可能认识到斯大林肃反的错误，也不可能找到对此进行批判的线索。正因为如此，